
延安女子大学评介

梁 怡

延安女大全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是中国共产党于1939年7月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大学,至1941年8月结束,先后开办13个班,培养妇女干部上千人。本文就延安女大的创办情况、办学特点和意义做一评述。

一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延安女大的背景、经过和目的

(一) 延安女大的创办背景

抗日战争是全国民众共同参加的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自抗战以来,许多全国城乡妇女纷纷以各种方式投身到这一战争之中,无论是战地服务、护理伤员、慰劳军队、宣传抗日,也无论是前线还是后方,都活跃着她们的的身影,涌现出许多优秀的新女性。而正是由于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工作,缺乏妇女干部,尤其是缺乏专职妇女干部的问题变的的重要起来。因此,大量培养妇女干部以适应抗战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刻不容缓的工作之一。

1938年9月,中共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实行国防教育政策,使教育为民族自卫战争服务”的决议。根据决议精神,结合妇女工作情况,1939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了《关

于开展妇女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党“用各种方法解释妇女大众在抗战建国及将来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注意于女党员的吸收及女干部的培养”。同年3月3日，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工作委员会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提出了妇女运动中关于统战、组织、教育、生活、妇女地位等五方面的工作意见，其中之一是要求为妇女大众提供免费教育的机会，尽可能“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培养与提拔妇女干部和领袖”，“首先动员和组织知识界的妇女及女学生，培养和训练她们成为妇运的干部，使她们不仅成为在妇女知识分子中进行工作的主力，而且成为到女工、农妇及家庭妇女中去工作的桥梁和先锋”。指示信最后特别强调：“有计划地、大批地培养、提拔和爱护党和非党的妇女干部，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枢纽。”这封指示信是经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通过的，是中共中央在抗战时期对妇女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当时，不仅客观上抗战建国事业需要大批妇女干部，而且主观上由于已经有许多城市女青年聚集延安，投身抗日，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等也招收过几百名女学员，因而在如何培养妇女干部方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开办正规的女子大学的条件逐渐成熟，经毛泽东建议，中共中央委员会批准在延安开办一所女子大学。

（二）延安女大的筹建工作

延安女大（以下简称女大）创建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当时陕甘宁边区受到日伪顽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各方面工作都十分困难。为了筹建延安女子大学，毛泽东带头捐献了做国民参议会议员的100元薪金，帮助女大购买书籍；董必武、邓颖超也

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69页。
《六大以来》，第770—775页。

将各自的参议员薪金捐作建校费用, 共计 300 元。考虑到窑洞较潮湿, 王明拿出 500 元参议员的薪金专用于购买木板, 制作了百余张木板床。此外, 女大所需的图书、开会用的幕布、煤气灯等也都是由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等人捐献而来。

女大的校址选在延安杨家岭与王家坪之间的一座山坡上。自 1939 年 3 月, 动员了当地 200 多民工紧张施工一个半月, 修建起了三座简陋的教室和一个简易的大礼堂, 开凿了 100 多孔新窑洞, 于 5 月开始接收学员。

1939 年 7 月 20 日下午 3 点, 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女大首届近 500 名学员举行了庄严而隆重的开学典礼。《新中华报》7 月 25 日第 3 版以整版篇幅报道了开学典礼的盛况, 庆祝“中共抚育下第一个伟大女儿的诞生”。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延安各机关院校负责人、来自前线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代表、印度援华医药队队长安德华以及延安各界万余人参加了开学典礼。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委书记兼女大校长王明首先讲话, 他就为什么要创办女大、女大需要培养什么样的干部、女大的现状及女大能否完成任务几个问题做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发言。之后,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讲话, 他强调指出: “女大的成立, 在政治上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 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的干部……假如中国没有占半数的妇女的觉醒, 中国抗战是不会胜利的。”最后, 他的寓意深远的结束语“全国妇女起来之日, 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 引起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接着, 右臂带伤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也作了简短而精彩的讲话, 他“希望女大赶快培养造就大批的妇女干部, 到全国各地去领导广大的妇女运动”。首长讲话后, 举行了隆重的献

《新中华报》, 1939 年 7 月 25 日第 3 版。

旗仪式。女大学员代表分别向中共中央、八路军、新四军和学校献旗并朗诵献词。开学典礼结束后,在女大举行了会餐和歌舞晚会。

(三) 办学宗旨和目的

女大校长王明在开学典礼上曾说:“一般地讲,女大要培养的是为民族解放、为社会解放、为妇女解放而奋斗的妇女干部。特殊地讲,女大要培养的是能在抗战建国时代忠诚献身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妇女干部。”因此,女大“以培养抗战建国的妇女干部人才”为宗旨;“以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为目的”。女大的一切工作都是围绕这样的宗旨和办学目的进行的。它与一般传统的办学方式所不同的是,为适应战时培养人才的需要,从繁杂的课程中订出几种简明的、在短时间内可以学完的课程,用8个月时间完成理论课学习,使学员打下初步的理论基础;同时,加强实践环节,开设实用性课程,安排学生参加边区政权工作,使他们获得实际工作的经验;加大自修力度,使学员掌握在工作中继续自修理论的基本功;学员的学习期限也不固定,因工作需要,随时可调出,完成任务后回来继续学习。这种非学院式的教学方式,便于学生毕业后能立即走向社会,投入工作,并在工作中边学边提高才干。两年的实践证明,通过这种教学方式,上述王明所言女大的办学目的已经达到了。

(四) 学校体制和学员编制

学校的最高领导机构是校务委员会,校务会直接对校长负责。第一任校长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妇委书记王明亲自担任。副校长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柯庆施。校务会下设:教务处、政治处、秘书长和总务处。中央妇委选派了优秀的妇女干部张琴秋、孟庆树、郭

靖和王志新(男)任处长。全校共有处级干部8名,其中5名是早期中共党员、留苏学生,2名是长征干部,1名在抗战前是大学生、地下工作者。

学校设党总支委员会,直属中共中央机关党委领导。中共党组织在女大成立初期是秘密活动,不久转为公开,正式建立党日制。建校初,学生中党员并不多,到女大结束时,学生中党员已占绝大多数。学校设立校友会,这是一个学生的自治组织,由全体学员选举产生。校友会下建立若干小组或俱乐部,并出版不定期手刻油印校刊。

女大的学员来自22个省,其中包括一名台湾人。还有自印度尼西亚、缅甸、新加坡、马来亚回国参加抗战的爱国华侨。学员中的一部分人由中共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转来;一部分是陕甘宁边区和各地方组织选派的,包括一些长征干部。招生简章也分发到其他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还有许多北方女青年通过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地下党介绍,穿越敌占区艰难跋涉而来。学员成份,知识分子占80%,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占4%。年龄最大的41岁,最小的14岁。为了因材施教,学校将学员按文化程度和类型分4种班次:普通班(共办了9个班)、特别班(1个班)、陕干班、高级研究班(两期两个班)。普通班学员约占全体学员的80%。其中,中学文化程度的70%,大学文化程度的10%,她们主要学习基本的革命理论。特别班的学员主要是长征干部或大城市的女工。参加过陕甘宁边区土改的基层女干部50余人被编成陕干班。特别陕干两班的学员要额外学习文化知识。高级研究班的学员是从普通班的学员中通过考试录取的,着重培养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妇女干部。

二 适应抗战需要的办学特点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先后创办了十多所学校,除著名的抗大外,还有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边区师范学校,以及延安自然科学学院、延安民族学院、新文字干部学校等。各校都坚持教育为抗战服务的原则,又各有自己的办学特点。女大在“培养抗战建国妇女干部”的宗旨之下,有如下办学特点。

(一) 课程设置突出理论性和妇运工作实用性的结合

女大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集体学习和个人专修并重”为教学原则,注重理论性和实用性的结合。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理论课(必修课),讲授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国问题、中共问题、三民主义)、哲学、妇女问题、世界革命史略、医药卫生常识、俄文(高级班)等。此外,高级班的学员还须研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矛盾论》《实践论》等理论著作。学校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及老干部为学员讲课,他们被称为大教员。王明、陈伯达、张仲实、王鹤寿、韩光、赵毅敏、张鼎丞、艾思奇等都担任过大教员。学校也请马列学院的一些高材生和其他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青年干部做各班的理论辅导员,他们被称为小教员。通过理论课的学习,给学员打下了初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基础。

另一类课是选修课,旨在结合妇女特点和妇运需要,对学员进行专门技能的培养,包括会计、速记、缝纫、新闻、音乐、文学、戏剧、外语(英、俄、日、世界语)等课程。每个学员选修两门,边上课边实习。如学新闻的到《新中华报》社去参观和实地学习编排校对;学师范的去教学学校勤杂人员的文化课;学会计的帮学校会计算帐。学校

还请冼星海、吴玉章、郑律成、肖三、刘炽、丁玲、郁文、傅连璋等各类专家来校做报告。这种灵活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到工作岗位后，很快可以胜任工作，成为多面手。

由于条件艰苦，学员没有课本。学校采取由教师指定参考书、学生预习、教员讲课详略结合、学员集体讨论的学习方法，为学员打下了良好的自学基础。

(二) 加强形势教育，提高政治觉悟

女大把对学员的政治培养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经常组织学员出席边区的大型会议和政治活动，听中央首长讲话。据统计，两年中，学员共听政治报告 50 多次。每当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或著作，学校很快组织学员们学习讨论。此外，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叶剑英、邓小平、蔡畅、帅孟奇等数十位中共高层人士都为女大做过报告，内容涉及政治军事形势、中共的战略策略、革命传统、妇女运动等。如洛甫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邓颖超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妇女运动，陈云讲监狱斗争，邓发讲广州起义。学校还常为学生组织时事报告。每周请名人讲座，在各种专题中，特别着重对国内外形势的分析。从 1939 年 9 月至 1940 年 1 月，全校共组织政治问题的报告 28 次，讨论 11 次，国内外形势研讨 16 次。学员们还参加为百团大战祝捷、悼念白求恩、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等大型活动。所有这些活动和报告都被学员称为“活的知识泉源”。学校两周一次的党日活动，曾请刘少奇 4 次到校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提高学生党员的党性观念。

(三) 学习生活军事化

为了使学员适应艰苦的战争条件，女大制订了“紧张的学习、

艰苦的工作、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20字校训。学员入校后，每天从早4点半起床到晚8点熄灯，其间出操、吃饭、学习、休息，学习和生活一律实行军事化。1939年底，日军曾企图渡过黄河进攻陕甘宁边区，陕甘宁边区受到严重威胁，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第一次反共高潮，延安实行备战。女大全体师生天天练习爬山跑步、防空防毒，并举行军事演习。

生活方面，学员们住集体通铺，以组为单位围成圈吃饭。被褥不够合用，衣服不够合穿。以盐代替牙膏，草木灰当肥皂。以后，学校成立了托儿所，为少数带孩子学员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便利。

这种紧张而又艰苦的学习环境磨炼了学员吃苦耐劳的品格，也培养了她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尽管生活十分艰苦，女大仍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积极参加边区的大型文艺演出。如女大与鲁艺、青艺联合演出《黄河大河唱》，夏革非主演话剧《秋瑾》，甘露主演京剧《花木兰》，这些精彩的演出有的还被拍成了电影。对女大和女大学员的精神风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曾有如下记述：1939年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个真正的女英雄的大学”。它的“整个体系是战时制度或他们所称的‘非常时教育’。但这是切合实际的”；“职员和学生都穿着棉制服、布鞋和草鞋，她们的短发上面戴着军帽。不敷脂粉。远远看去你辨不出她们和男孩子的分别。她们总是露着笑容……”；“在这么僻远的角落里，有这么一个全国性的女子大学已够诧异；而其中的妇女还在兵荒马乱中来自中国所有的各省，那就显得分外惊人了……那是一种真正求知的饥荒。有几个美国女郎，会从战区中跋涉五百英里去进一个窑洞的大学，而在那里还得种植她们自己的菜蔬”。每个学生每月花费约等于美金

四角。

(四) 参加社会活动, 在实践中培养学员能力

为贯彻“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教学原则, 女大适时组织学员参加边区政府的社会活动, 这些活动主要有:

1. 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妇女宪政促进会。1939年9月, 国民参政会举行了一届四次会议。在中共参议员和中间党派参议员的一致努力下, 通过了请国民政府明令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的提案。不久, 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接受了此议案, 决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 并于6月底前将国大代表选举手续办理完毕。此后, 中国共产党为推动宪政的实现, 开展了宣传运动。1940年初, 女大率先发起成立“延安各界妇女宪政促进会”。1月17日, 召开了延安女界2000多人参加的成立大会。大会发出《告全国姊妹书》, 将延安妇女要求参政议政、男女平等等意见公之于众。大会选举了延安各界妇女宪政促进会理事会。女大的孟庆树、张琴秋、郭靖等人当选为理事。在以后的宪政促进活动中, 女大学员积极宣传, 组织了多次专题座谈会, 并于5月19日在女大举行了宪政辩论会, 女大(反方)和马列学院(正方)各出5名学员, 组成两队, 就“实施宪政, 还是继续训政”问题激烈辩论。女大及延安各机关千余人旁听了6小时的辩论。

2. 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选举工作。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治问题》的指示, 提出在各抗日根

[美]埃德加·斯诺:《为亚洲而战》, 见《斯诺文集》第3卷, 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第228—230页。 [美]路易斯·惠勒·斯诺:《斯诺眼中的中国》, 中国学术出版社1984年版, 第187页。

荣孟源、孙彩霞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第609页。

《新中华报》1940年2月3日第5版。

据地建设“三三制”政权。为配合此项工作,1940年12月,中共中央抽调女大高一班同学四五十人与其他单位的共计120人到陕甘宁边区选举训练班学习。之后,女大学员多数被分配到绥德分区下辖的5个县,少数被分配到瓦窑堡参加民主政权的选举工作。薛明任清涧工作团团长,冯林任吴堡和葭县工作团团长。参加工作团的女大学员在各地县区中共党委领导下,深入群众,宣传动员,耐心讲解选举工作条例。在绥德地区,专门组织开明士绅去延安访问,开座谈会。米脂工作团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向该地区国民党党部的党员讲解中共不赞成一党专政、“希望各党各派联合专政”的主张,欢迎他们参加竞选。为了使更多的妇女参加选举,工作团团员深入到农妇的炕头上动员,并采纳她们提出的“烧洞洞”、“投豆子”的选举方法。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各县都选出了群众满意的民主政权。11月初,团员们调回延安,参加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筹备工作。

3. 参加政权工作。1941年初,中共边区党委决定派女干部邵清华到安塞县任县长,女大高级班学员章岩、路岩、李蕴辉协助工作,分别担任县长办公室秘书、民政和文教科长。三位学员在县长带领下从抓经济工作入手,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以自己的行动,消除了“女同志不能办大事”的错误观念,打破了“洋包子”与“土包子”、男同志与女同志的隔阂,得到县里干部群众的普遍好评。

4. 组织妇女工作团。为了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第一次反共高潮,配合八路军在绥德等地的斗争,1940年春,中央妇委和陕甘宁边区妇联先后从女大抽调23人参加绥德、米脂、郃县及陇东的妇女工作团深入农村。她们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广泛接触群

纪念延安女大五十周年筹委会编:《延安女大——(1939—1989)》,1989年版,第120页、131页。

众,进行农村家庭调查,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2)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的造谣中伤,宣传中共的统战政策,宣传抗日救亡和参加生产支援前线的重要意义。(3)宣传妇女解放的道理,参与调解家庭纠纷,规劝婆媳和睦,调解妇女婚姻问题。(4)开办夜校和妇女识字班,学员路毅还应庆阳女校要求担任校长。(5)陇东工作团协助县政府推行“马锡五审判法”(马锡五是该县专员,成功地办了刘巧儿告状一案)。

5. 参加征粮工作团。1940年10月,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工作开始。边区政府从女大抽出44名学员成立了两个征粮工作团,到绥德县和清涧县参加征粮工作,主要任务是捐募救国公粮和寒衣代金。有些地主不愿认交甚至躲避,学员们坚持统战政策,耐心说服,动员他们认交了公粮,于11月圆满完成了征粮任务,受到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表扬。

6. 参加生产运动。建校初,女大学员同男子一样上山开荒,到30里地外收庄稼,背运粮食。后来,在中共中央关怀下,女子改为手工劳动。1940年3月,女大开办了手工业工厂,每月可制鞋300双。有制衣机8部,日制衣180套。此外,学员们编织毛衣、制造简单的药丸,自己养猪种菜,自制豆腐。仅在1940年3月受到边区政府通报表彰的劳动模范中,女大就有3人荣获模范妇孺工作者称号,有99人当选为模范妇女。其中,陕干班、特别班工农出身的学员最为突出,当选劳动模范的也最多。

此外,女大还参加一些抗日救亡的公益活动,如慰问伤员、捐钱捐物救助灾民、认购救国公债、援助国统区人民的抗日爱国斗争等等。

通过这些实践活动,学员们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和提高。那些来自城市的学员,从思想感情上贴近了农民群众。在实践中她们磨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增强了妇女参政的信心,树立了新型妇女

的榜样,为边区妇女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她们的工作,不仅唤取了广大农村妇女的觉悟和参政热情,而且取得了实际的成果。据统计,全边区30%的妇女参加了选举,其中清涧县达90%。选出乡级女参议员2005人,县级167人,边区级17人。许多妇女荣任乡长、区长。邵清华正是在这次选举中当选为边区第一任女县长,时年24岁。

(五) 执行中共统战政策。

女大是共产党创办的,当然首先要为中共培养妇女干部。但是,女大又是中共统战政策指导下的学校,容纳不同信仰的学员。学校有中共党员,也有国民党员、基督教徒、无党派青年。“它所要求的女同学的学习志愿只有一个,就是坚决抗战”。学校订了近百种报刊,不同思想不同信仰和不同党派的报刊杂志学员们都可以读到,如《新华日报》《新中华报》《大公报》《扫荡报》《中央日报》《民族革命》《世界知识》《救亡日报》等。学员间有不同思想可以坦诚交流,甚至争辩。校内实行民主生活制度,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因此,学校内共产党员与非党员的关系也非常融洽。

三 创办延安女大的意义

1941年至1942年是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期。为了战胜困难,中共中央决定实施“精兵简政”的方针。1941年7月30日,中共中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编:《中国妇女运动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第496页。

《中国妇女》第2卷第7期,第22页。

张晓梅:《延安女大在抗战中的作用》,《延安女大》,第220页。

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将延安女大与陕北公学和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定名为延安大学,由吴玉章任校长。原女大校址改为延安大学的大学部。女大的多数学员被分配了工作,少数人继续学习。1941年8月底,女大停办。

延安女大虽然只有两年的历史,却在中国抗日战争史和妇女运动史上显示出了它的创办的重要意义。

首先,女大的创办推动了抗战时期妇女运动的开展。延安女大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为适应抗战对妇女干部需要所做的一个创举,在当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在中共党内,“由于女大的成立,转变了某些不注意妇女工作以及轻视妇女工作的不正确的观点,提高了全党对妇女工作对女同志的爱护关心与帮助”。在共产党外,首先是对“国民党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决定成立妇女部,国民政府拟创办专门妇女师范学院,国民党七中全会也要成立妇女部等”。另外,女大学员不断地被输送到妇女干部队伍中,不仅是为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促进妇女解放做了实实在在的努力,而且使妇女干部队伍的构成、知识层次、工作能力和水平都发生了一个飞跃,从而推动了妇女运动的开展。

其次,女大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妇女干部。两年中女大共培养学员上千人,先后有两届学员毕业。经过政治、文化、技能、实际工作多方面的教育和锻炼,女大塑造了一群抗战及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事业需要的文武双全的巾帼英雄。她们懂政策,有知识,又能打仗。许多学员毕业后调入中央妇委、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部及其他单位工作,无论在前线或在基层,都表现出了出色的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如彭克谨是陕甘宁边区国共合作的绥德市第一任中共方面出任的市长。如乌兰学员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内蒙

工作,被蒙族群众称为“双枪红司令”。女大还为新中国的建设培育了大批优秀女干部。新中国成立后,女大的近千名学员几乎分配到了全国所有的省市自治区,遍及各行各业。她们中有副省长、省人大副主任、自治区副主席、省政协副主席、省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长、省顾委常委、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丁雪松、著名表演艺术家于兰也是女大毕业学员。据初步统计,女大毕业学员中,有近 10 名部级干部,有 80% 的人是局级干部。如果不入女大,她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只是一个翻身的童养媳或女工、识字不多的女战士、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

综上所述,延安中国女子大学为中国妇女运动、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到目前,历史学家对它的研究甚少。然而,仍然健在的女大学员最年轻也已 70 多岁了,女大留下来的文字资料又不多。因此,通过她们了解女大、研究女大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作者梁怡,1956 年生,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